

大东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沈阳

责任编辑 孙德昌

大东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插页5 印张5

字数 120千字 印数1—1000册

黎明印刷厂印刷

前 言

在庆祝党的“十三大”召开之际，《大东文史资料》第一辑，在中共大东区委的关怀下，应运问世，这是我区政协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中的一个可喜成果。

文史资料研究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根据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全国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征集、整理、出版区文史资料专辑的。内容以刊登本地区的史料为主，长期征集，陆续出版。宗旨是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惠及子孙后代，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大东区是沈阳市城区之一。古往今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风土人情等，源远流长，遗迹佚史丰富；知名人士、志士仁人荟萃，蕴藏着大量史料。我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具有风采的社会阅历，渊博的知识，广泛的社会联系。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撰写，随时惠稿，为抢救我区近百年来的各类史料做出贡献，将不胜感激之至。愿本辑出刊，能在广征博采文史资料方面，起到“可激共鸣、百花争妍”的作用。

编辑本刊承蒙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及区地方志、区党史征集办等各方面的热忱支持，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资改进。

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张学良将军二、三事	姜明文 (1)
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	姜明文 (6)
吴俊升	孙德昌 (18)
巍巍兵营话沧桑——沈阳东大营	高景生、孟繁宗 (23)
张作霖统治时期的沈阳金融	田锡侯 (33)
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沿革	姜明文 (41)
“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东军的阴谋和战略	张作宪 (57)
“九·一八”事变亲历记	姜明文 (67)
江桥之役和马占山抗战	邢介兴 (81)
国民党“接受”东北时期三人小组的活动	姜明文 (88)
卫立煌逃离沈阳前后二、三事	姜明文 (97)
城堡式山陵——福陵	孙德昌 (99)
沈阳古城的门脸	胡 乔 (103)
沈阳天后宫	胡 乔 (106)
沈阳城最特殊的古刹——魁星楼	胡 乔 (108)
沈阳木材码头	东 志 (110)
沈阳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肇新窑业	东 志 (112)
东关柴草市	东 志 (114)
东关菜行	方 志 (116)
明清沈阳古战场的遗迹——骨灰窖	方 志 (118)
沈阳第一个公园——万泉公园	方 志 (120)
沈阳东关基督教会	蒋明志 (122)
盛京施医院	蒋明志 (125)
沈阳最早医科学校——盛京医科大学	东 志 (127)

坤光学校.....	蒋明志、金桂枝(130)
龙吐天浆泉涌玉液三百载——沈阳老龙口	
酒厂.....	姜永琴(132)
三五〇五厂的今昔.....	康 凯(137)
锡伯族简介.....	何少文(140)

张学良将军二三事

姜明文

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争失败后，张学良协助其父，整顿队伍、编练新军；扩充讲武堂、培养军事人材；加强空军建设并扩建海军。他说：“这些建军规划，必须从根本做起，小改小换是不行的。”同时又说：“彻底整顿军队既要照顾到当年和父亲在一起打江山的老一辈人物；又要精选一批后起之秀。”这些建议颇得乃父的赞许。以后张作霖的一切整军措施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逐步实行的。如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总监，张作相、姜登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副监，他自任参谋长，这样，即照顾了老一辈人物的情绪，新起用的人物也高兴。

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具有很大的权力。除了最高军事决策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直接掌握外，其他如部队整编改革、人事任免、升迁等都由整理处来处理。

在扩建空军方面，除原有的飞龙、飞虎、飞鹰三个航空大队外，又扩建了飞鹏、飞豹两个航空大队。张学良自兼空军司令。选拔培养青年学生学习航空技能，同时选拔一批优秀青年送国外深造。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已拥有各式飞机四百架，为旧中国空军一支劲旅。

在扩建空军的同时，又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内，成立航警处，并在哈尔滨、葫芦岛两地成立海军学校，培养人材，训练海军军官。最后拥有“镇海”、“威海”、“海圻”、“海

驱逐舰”等各种大小舰只二十多艘，海军官兵三千多人，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绝对优势。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有关易帜事宜在秘密进行中，日本极力反对。张学良治丧开吊之时，有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使节林权助，诱惑张学良将军，他说：“少帅要想统一中国，我们大日本愿意帮助你一切，保证一年内就可统一中国……”张学良严肃地回答说：“请你不要忘记我是中国人，我不做这个卖国的蠢事。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大义凛然，如闻其声。在当时，国民政府中握有实权、拥有最大的军事力量的只有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掀起中原混战历时数月，战事不能解决。冯玉祥当时拥兵五十万，深沟高垒，雄据中原。阎锡山的主力又进入山东，把蒋介石打的焦头烂额。但最后冯、阎终于瓦解。其原因在于：在政治上蒋介石策动了梁冠英、吉鸿昌的投蒋，使冯军内部瓦解；在经济上冯军官兵每月只有六元钱，生活太苦，士兵厌战，以致最后造成冯玉祥军队众叛亲离，连在河南焦作的老底也被他的亲信抄光。进入山东的阎锡山部也被蒋介石吃掉等等。这些固为冯、阎失败的因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张学良把东北大军十余万调入关内，帮助蒋介石而取得“胜利”的。

二

1934年，张学良从欧州考察归来不久，蒋介石意在消灭异己，坐收渔利，自兼鄂、豫、皖、“剿匪”总司令，特任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

自东北军在热河长城线上同日寇作战以来，张学良发现东北军战斗力不强，有些军官生活堕落、吃空额、卖给养等等贪污现象。为此，张学良一直难忘，深深感到东北军正在腐化下

去，要不加以整顿，非但谈不到打回老家去，就是生存也成问题。所以很想找个机会整顿一番。张在接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后，就在总部内成立一个机要组，派陈旭东为机要科长（少将），责成他调查清理东北军内部的腐化情况及东北军各部队的真实战斗力量，以作为着手整军的准备。

1935年夏季，张学良去庐山为整军事面见蒋介石，谈了他要对东北军进行整顿的意见，并计划取消军以上的单位，把一个军整编为一个师，改称为“整编师”。但对这种师的建制人员与火力配备，均要大于现在的一个军。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意见，就连连点头，连说好、好、好！对张学良大加称赞一番，同时对他说道：“现在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军衔泛滥，如果把整编师的师长军阶定为少将，只个别的才委为中将，这样，全国在军阶上也可进行一番整顿了。”并要张学良先在东北军试行，做出样子，其余部队再跟着办。

张学良回武汉后，就电召驻在麻城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到武汉，研讨整编的具体办法，并预定由六十七军开始试行，先改为整编师，就按蒋介石的意见，师长定为少将级。当王以哲听后尚在沉默犹豫时，张学良对王以哲说：“鼎芳（王以哲之字），你不要想不通，我们应当从抗日实力着想，至于个人军阶是小事，我们规定一个整编师的建制人员、武器、战斗力全高于现在的一个军，虽称为少将师长，可是实际拥有的实力比现在一个中将军长强得多了。你先作个示范。接着就整编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这样，我们把所有的东北军作一番大的整顿。经过整顿东北军必将振奋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就为抗击日本打回老家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以哲听了张学良的解释，欣然接受。并向张学良提出请求，要总部派陈旭东参与，协同军部的几个高级参谋共同起草整编师方案。

张学良的一片苦心，并非东北军所有将领都能理解，更兼有蒋介石的阴谋，所以议论不一。这时，驻在保定的第五十三

军军长万福麟闻讯跑到汉口，下榻在太平洋饭店，立即邀王以哲会面。一见面，他就对王以哲大发雷霆，质问王以哲：“鼎芳，你太不够朋友了，我万某没有错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拆我的台。副司令想要打回老家去，有点想昏了头，用自己的刀，砍自己的腕子；人家都要扩充实力，他却出洋相，反要削减自己的军队，把一个军硬要缩编成一个师。我是黑龙江督办啊，降为一个军长，早就抱着委屈呢，现在还要连降三级，当个少将师长，听说是你领头要这么干，还要拉我作陪葬，这是妄想。”王以哲虽一再解说张学良的意图，但这个万半拉子（万福麟的绰号）仍是理解不了，想不通，吵闹不休。当时在武汉哄动一时的“万半拉子大闹太平洋饭店”的内幕就是如此。后来经张学良召见万福麟，又对他耐心解说，万福麟虽然仍不甚理解，但也只好憋着一肚子闷气回保定防地去了。

万福麟的一盆冷水，使整军方案的进展受了一定的阻滞。正当此时，江西红军突围长征，北上抗日。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武昌行营，特任张学良为行营主任，事务一忙，整军方案的实施就暂时搁置了。

三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驻守安徽一带，与日军对峙的是第十战区临泉指挥部副司令官何柱国所部。何部是原东北军张学良部下仅有的旧部。陈旭东当时任副长官参谋长兼敌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间，陈旭东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住家，突然进来一个由重庆派专人送来一个文件包。上面是火漆加封，写着“火急”、“极机密”、“陈旭东亲拆”等字样。陈打开后，从包内取出一叠黄綾子，另外还有密信一件。陈旭东将黄綾子一张张仔细地看后，共三十三张。每张上面都是用墨笔写的字，迹劲熟练，一看字就知道是张学良亲笔所写，

看到署名果然是“张学良”三个字。

黄绫子长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每张都是写给原东北高级军政人员的信，内容都是一样。还不到二百字的简短的信，用语很客气，简明扼要。主要意思是希望收信人团结一致，积极抗日，效忠国家民族，服从党国命令，收复失地，努力奋战……。

另一封信是戴笠给陈旭东的一个极机密的代电。原来张学良写的这些黄绫子密信，还是蒋介石批准才送出来的。戴笠要陈旭东尽快地把张学良的信尽一切可能分送给收信人。很明显蒋、戴的意图是想通过张学良的这一爱国行动，把东北高级军政人员拉向蒋政权，听从他们的指挥。

从第二天起，敌后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信使四出，连陈旭东的老婆（家庭妇女）也把这黄绫子密信缝到衣服的夹层里，秘密地去北平送给收信人了。

（注）陈旭东原名陈昶新，铁岭人，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毕业，后经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深造，回国后颇得张学良的信任。弟兄三人，大哥陈再新在东北军当旅长，第一次奉直战时阵亡。三弟陈烈新字阜东，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现任吉林市政协委员。

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

姜明文

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1925年初，我来沈阳，本想考取文会书院念书，未果。在街上看到“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招考学兵的广告。我当即到北大营报名，经考试被录取，分配到第一营第四连。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

当时的教导队队长是由张学良兼任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少帅”，如果能到教导队当学兵，便于和他发生关系，于个人的前途是有好处的。因此，我就决心进入教导队，不管怎么苦、怎么累，我都咬着牙挺着干。

1925年春，有一天排长（值星官）通知，要把内务特别整理好，院子打扫干净，本来内务、清洁是每天必须严格整理好的，而今天，还要好上加好，被垛用绳子拉成线分毫不错，同时告诉郭军长今天来视察，大家听到也都很兴奋。因为每天在操场上出操时，都影影绰绰的看到郭军长和二个人抬一挺德国制造的马克沁式重机关枪，和一群人在一起，听指挥的人口令作前进、跑步、卧倒、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动作。那一群人都是军官教育班的学员，他们都是各部队抽调来的排长以上现职军官，来受训的。我当时很奇怪，一个当军长的还跟学员一样出操，这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是没有的事情。不一会郭军长来到我们连里视察，看到：他的面孔是微白的，两目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宏亮而爽朗，穿一身灰布军衣，黑色钩子皮鞋扎绑

腿，系武装带，肩上有—付金光闪闪的中将肩章，—个随从参谋（参谋人员的领章上有铜质带竹节的×，表示胸有成竹的意思）夹着皮包，跟在后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松龄。

军官教育班

是年八月间，教导队举行期考后，郭又到教导队以营为单位进行点名，凡是期考成绩列在前十名的学兵都挑出去了。我是被挑出者之一。在点名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并简单的问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什么学校毕业等等，然后集合讲话。他说：“看到你们考试的成绩还不错，把你们挑出来，转到军官教育班去念书，希望你们要好好努力用功……”随后我们各人携带衣物、行李到东山咀子军官教育班本部报到。这时，东大营（即现在的东山咀子）已经建成新的营房，原在北大营教育班学员也都搬到新营房来，他们编成三个队。由教导队挑去的学兵编成第四队，由应鸿伦任中校队长，少校队附有邓玉琢、裴焕彩等二人。

教育班是郭松龄—手经办成立的—个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军学教育内容上与讲武堂大致相同，但学期为二年，比讲武堂还多半年，另外增加英、法、德、日等外语课，准备将来保送到各国去留学。讲武堂学员的领章是两道红杠，教育班学员的领章中间是—道红杠，学员假日外出时，腰扎皮带，带刺刀，这是与讲武堂学员有区别的地方。

教育班由郭松龄兼班长，彭振国（别名筱秋）少将任教育长负专责，总队长是上校王云汉。教育班举行开学典礼时，郭亲自参加，郭夫人韩淑秀也随同出席。郭讲话时间很长，大意是：“当今世界军学日新月异，武器也随之改进，东北地处两大强邻之间，时时都在窥视我们，执干戈，卫社稷是军人之职责，但必须有新的学识才能担当这个重任，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具有一般文化，现在既有从戎之壮志，更应努力学好新

的军学知识，现在把你们选到军官教育班受军官教育，国家对你们抱有很大希望，你们要好好用功，勤学苦练，服从师长，不要辜负国家培养你们的厚意……”。以后郭经常到教育班来，有时集合讲话，有时到各处巡视，有时抽问学员们生活情况，看不出是一个当中将军长的大官样子。态度是严肃的，但不是令人可畏，在每个同学的思想中无形产生一种敬佩之心。

入学后在军事学术科方面，开始与在教导队时相同，也是讲典范令、立正、稍息等制式动作，所不同的是增加有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课，我被分配到德语班。我在辽阳文德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有一点基础，希望继续学英语，分配到德语班很不乐意。向队长应鸿伦请求调换一下，应队长说，“分配到哪班就是哪，不能随便要求”。碰到一个钉子，但心里总是不安。

第一次见到韩淑秀

1925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小河沿魁星楼附近安家鞋铺买“傻鞋”，因为他们做的“傻鞋”坚固耐用。当路经水簸箕胡同西口时，我灵机一动，何不到军长家谈谈去，给见就谈，不给见拉倒，反正不是犯错误的事。原先也常听别人说过，凡是去军长家的学生他都接见，因此鼓起了勇气。一进门房，传达人都问，“干什么？”我说见军长有点事。传达说“不在公馆，你是那里的”。我说：“是教育班的学生。”正在这时，韩淑秀由上房出来，（他住的是四合院没有二门）问传达，他那是？传达说：是教育班的学生，要见军长。韩淑秀说，叫他进来，我进了东厢房的客厅。韩淑秀问：“你叫什么名字，见军长有什么事？”我报名行礼后，说，我是新由教导队挑到教育班的学生，分我到德文班学德文，我英语有点基础，想继续学英语。韩淑秀说：“现在世界各国的军事学，德

国最好，叫你学德文，学好后，准备到德国留学不好吗？你有英文的基础，学德文更容易些，实在不愿意学德文和彭教育长说一声给你改英语班”。就这样，我行礼辞别了韩淑秀，到安家鞋铺买双“傻鞋”回到教育班。我听韩淑秀这一说，学好将来可以到德国留学，我也就没有再请求转英语班了。（当时教德语的教官是齐世英又名齐铁铮，现在台湾任立法委员）不久，奉军进兵关内，由河北、山东、安徽又进而占领江苏直达上海，这是奉军最盛时期。军官教育班第一期的学员，也没等到毕业，都纷纷回到原部队任职去了。

我留在郭松龄身边

因为军队都纷纷进关，各部队的初级官员都需要补充、调换。我们第四队的学生，郭松龄也都挑年龄大的陆续派到部队当准尉排长，每派一个人，郭事先必须找去详细的问话，然后亲笔写一个二寸宽五寸长的便条“派令”。也不通过主管人事部门办手续，就拿这个“派令”直接到差。“派令”是这样写的：“兹派×××为×旅×团×连准尉排长，克日前往报到，并具报，此令。”郭松龄签字，并发给五十元钱买指挥刀、军衣罩、武装带、鞋、帽等物，一个个都高高兴兴的前往报到。当时在军中无论办什么事情，只要有郭松龄签字的便条，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也可见郭在奉军当中时的权势了。全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郭松龄虽然不能个个都认识，但每个人对郭都有爱戴的心情，因此，郭松龄三个字当时在奉军中各级军官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也是由于这一点，而造成他倒戈反奉的基础。

“官雨”越下越大。最后一直派到年满20岁的都出去当“官”了。我那年十九岁。填表时，我也把年令自己长了一岁，也填上二十岁。有天郭找我，当时认为这回外派该轮到我了。当我到办公室行礼后，郭说：你十九岁为什么要报二十岁。我说，二十岁不就可以当官了吗？郭笑啦，随即说，不要着急当

官年令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也没有作战的经验，以后还怕没有官当嘛？最后剩下十七至十九岁的学生六十多个人，郭松龄集合讲话，说：“你们年令还小，没有带兵的经验，更没有作战的经验，现在军队出发，有战斗任务，就不再往外派你们去当官了。把你们分给‘少帅’（张学良）一半，其余的留在我身边”。随即点名分开了，我分到郭的这边。不久我们随郭松龄去天津。驻在河北大街曹家花园内，（系北洋军阀曹锟住宅）我们每天轮流值勤四小时，其余的时间规定看书、打球，不准随便外出，有事向队长请假。韩淑秀经常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讲“楚汉相争怀王立约先入关者王”的故事。有时也问我们每个人家中情况，如问你是哪县人？父母都在不？家里还有什么人？哥几个？家里有地没有？打的粮食够不够吃等等琐事。她身穿布衣，颜色都是很朴素的，不事装饰，说话很柔和，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

滦州车站军事会议

十一月上旬郭松龄因病在天津住意大利医院，韩淑秀随同前往，我们卫士也去了几个，换成便衣住在医院作警卫和传达，每天来往出入的人很多，究竟做什么，说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不久，郭出院我们由天津上火车，听说是回奉天，大家都很高兴，离家快一年啦，这时可以回老家看看。不料郭的专列指挥车到达滦站即停下来，在一个火柴公司楼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团、旅长和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其中认识的有邹作华、王静轩、郜汝廉、殷汝耕、齐世英和曾给黎元洪当过内务总长的林长民，当秘书长的饶汉祥等三、四十人，韩淑秀也参加会议，调一个亲信的步兵团担任外卫警戒；内卫警戒由卫队担任；会场内外的警戒则由教育班的三十多个同学担任。我们每个人都佩有一支短八分的合子炮，和一挺“巴尔克满”手提式轻机关枪，胸前系有皮子弹袋一条，内装四个“保

弹板”全付武装担任警戒勤务，没有郭的手令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在楼梯间和楼门口都有岗哨。真是里三层外三层，警戒森严。在楼梯间一个小屋内有一位身材矮小年约五十多岁，手里拿着旱烟管，倒背着两手，来回踱着慢步，屋里点一支腊烛，最初不知他是何人，后来听总队长王云汉说，他是姜督办，我们心里想，怎么把督办押起来啦。（姜登选别名超六，安徽人）

在会议开始，郭讲话时间很长，讲话大意现在经过仔细回忆有这样一些话：历年来战争耗财巨万，致使东北民穷财尽，钱法日益毛荒，去年与曹、吴之战，是我们为保土安民故不得已而为之，此次之战，师出无名，徒为姜、杨争地盘，为上将军谋总统，这种兵连祸结，为少数人谋利益，争地盘而空耗国币，徒增民困。此时班师回奉，纯为清除乱源，改革东北政治，不事内争，而以休养生息为目的。上将军年事已高，暂息仔肩，怡养天年，让位与少帅，内修政治整军经武，外御强邻以固边防……。韩淑秀也讲了话，大意是说张作霖多年来穷兵黩武的罪恶事实，把一个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东北家乡祸害得民穷财尽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孩子们不能念书，我们跟前这帮孩子就是例子，他们念不起书，才出来当兵，不兴办教育，不培养人才，不开发实业，徒事穷兵黩武给少数人争权夺利……。他（她）们的讲话，我们值勤的人都听得很清楚，真是感人肺腑。会议结束把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已快天明，第二天看到一份油印的，电文很长的一份通电，历数张作霖历年来勾结日本，签订条约，以大量的金钱购买武器，从事争夺地盘的罪恶战争。这份电文是饶汉祥的手笔，下署“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张学良、副总司令郭松龄。”我们看了这个署名的电文，心里说，儿子倒他爹的戈了。紧跟着一道“升官图”的命令，团长升旅长，旅长升军长，如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等均由旅长升为军长。魏益三初为参谋长，旋即调为第五军军长，

参谋长调炮兵司令邹作华升充。邹作华原任东北军的炮兵司令，是炮兵界的权威者，郭的反奉倒张，邹在内心本不倾服，以此调任参谋长，孰知后来郭军方面将不用命，士无斗志，特别是炮兵部队不发实弹，邹还暗中通款，张作霖向前方部队发出传单，很起作用。郭的失败，这也是原因之一。

枪杀姜登选

在滦州会议的当夜，郭将姜登选扣押在火柴公司的楼下一个楼梯间。姜之所以被扣，是姜由天津乘专车返奉路经滦州时，郭闻姜的专车到达，以请姜氏晤面为名，遂即扣押，但并未见面，会议第二天郭的专列指挥车仍停在滦州车站，升火待发，下午听到把“姜督办枪毙了”的消息，以后又听到枪毙时经过的情形是：由一个王副官（左手有残疾，外号叫摔瓜子）带两名卫士坐汽车以送姜到城里为名（车站距县城八里路）行经一段沙滩地，车就不走了，由王副官向姜说，这是段沙滩地，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即下车前行，王副官在后面，走不几步，王即向姜开始射击，“砰”的一声，姜即应声而倒，随后连打两枪。显赫一时当过安徽督军的姜登选，就这样丧生于沙滩。王等收尸体就地掩埋后，即回车复命去了。郭军失败后，张作霖为纪念姜登选，在奉天城西南面风雨坛，修了一座祠堂，名曰“姜公祠”。

挥军东进、连山暂停

郭松龄此时已将所掌握的奉军精锐部队（约七万人）编组为四个军，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担任第一线攻击部队。以魏益三的第五军军长（预备军）在九门口、石门寨一带担任后方。当时郭认为奉天所有精锐部队都在自己掌握中，沈阳没有部队，吉林第十五师长张作相部曾占据山海关，但不堪一